

# “克里奥的宫殿里有着许多房间”

——采访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格哈德·A. 李特

景德祥

---

[编者按]格哈德·A. 李特(Gerhard A. Ritter)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李特1929年出生于柏林,二战后在柏林自由大学求学期间曾担任德国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一译梅尼克)的学术助手,并成为迈内克在纳粹时期流亡美国的学生汉斯·罗森伯格(Hans Rosenberg)在柏林任客座教授期间的第一批德国学生。作为罗森伯格的批判社会史理念在联邦德国的主要传承人,李特在德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并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史研究人才。他最为有名的学生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认为,李特对德国社会史研究的贡献“至少与汉斯·罗森伯格一样大”。李特在德国政党史、议会与选举史、福利国家史、工人史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其他批判社会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不同,李特并不认为社会史必须独霸史学界,而是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与其他分支包括传统的政治史和睦相处。李特因其学术成就与包容性在联邦德国史学界受到同行的广泛认同,1976—1980年曾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并在1990年德国再统一之际担任原东德历史科学重建工作的领导人。李特先生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在2006年的古稀之年还推出了广受赞赏的力作《德国统一的代价——再统一与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sup>①</sup>并因此获得了德国史学界的最高奖项——历史学家奖。他虽然身为社会史研究的先驱,但并不歧视外交史研究。2013年,已经84岁的他又出版了外交史专著《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外交部与德国的统一》。<sup>②</sup>就在同年11月初,李特先生应邀参加“北京论坛”国际学术会议,并于11月5日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关于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史的学术报告。老先生精力之旺盛,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此前一天,笔者对李特先生就德国历史与历史学作了专门采访。由于录音的整理与核对花费了较长时间,再加上其他工作的影响,采访文稿未能及时发表。鉴于老先生身体之硬朗,笔者以为,再晚也能让他看到这篇采访的中文版,不料在去年6月末收到李特先生的学生魏斯(E. Weis)先生转来的噩耗,说李特先生已经于6月20日以86岁的高龄在柏林逝世。本刊特此发表这篇两年前的采访,以介绍与追悼这位杰出的德国史学前辈。<sup>③</sup>

---

① Gerhard A. Ritter, *Der Preis der deutschen Einheit Die Wiedervereinigung und die Krise des Sozialstaats*, München 2006.

② Gerhard A. Ritter, *Hans-Dietrich Genscher, das Auswärtige Amt und die deutsche Vereinigung*, München 2013.

③ 李特先生的弟子魏斯先生也对本采访做出了贡献,特表谢意。

问:在20世纪90年代,于尔根·科卡的一位学生发表了一篇题为《父辈们的社会史研究》的论文,<sup>①</sup>他把科卡一代称为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父亲一代”。您是科卡先生的“博父”,<sup>②</sup>可以说是联邦德国社会史研究的“祖师爷”或者为数很少的几位“祖师爷”之一,您能对德国社会史研究作一简要的概述吗?

答:(笑)是的,可以这么说吧。几乎所有人在提及德国社会史研究时都使用“比勒菲尔德学派”的说法,<sup>③</sup>而科卡自己总是说“柏林—比勒菲尔德学派”。科卡在许多论文中提及,社会史研究有一个源自柏林的传承,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也就是说早在比勒菲尔德学派产生之前就有了。实际上,德国的社会史研究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首先,我的看法是,最初的阶段是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这一学派对我影响很大。桑巴特(Werner Sombart)、韦伯(Max Weber)还有“社会政策协会”(Verein für Socialpolitik)的那些专家们,如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研究,都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我想,德国社会史研究还有第二个来源,特别是对于柏林方面来说,这一来源就是汉斯·罗森伯格。罗森伯格虽然不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但他在1949—1950年在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期间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关于要将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与政治学引入历史研究的主张。这是罗森伯格最大的心愿,后来他与我成为了好朋友,我也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在一本关于迈内克的书中,我出版了罗森伯格一生中写给迈内克的长达一百多页的书信。<sup>④</sup>我与他也都成为了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名誉博士,他在前,我在后。社会史的这一传统,比勒菲尔德的社会史学家是承认的。韦乐(Hans-Ulrich Wehler)不是我的学生,但科卡、凯伯乐(Hartmut Kaelble)、卡琳·豪森(Karin Hausen)还有后来的吕迪格·冯·布鲁赫(Rüdiger vom Bruch)以及克劳斯·滕费尔德(Klaus Tenfelde)都是我的学生,所以如前所述,第一代的德国社会史研究是帝国时期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然后是罗森伯格的学生,再就是我的学生。这些又得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关于初期工业化史的重大研究项目的加强,该研究的带头人是沃尔夫拉姆·菲歇尔(Wolfram Fischer)以及鲁道夫·布劳恩(Rudolf Braun)。凯伯乐与科卡也参与了,由此也受到了经济史的影响。以前在德国,经济与社会的讲席绝大多数是由同一人担任的。今天不再是这样,经济史在德国已经很数学化了。一般来说,今天的经济史学家不再同时是社会史学家,但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有着很强的历史关注。施莫勒曾经编纂过著名的普鲁士历史档案集(Acta Borussica)。

柏林的社会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在闵斯特(Münster)大学被继续推进了。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克劳斯·滕费尔德。他已经不在世了,他撰写了一部非常好的研究鲁尔矿区工人阶级的博士学位论文。<sup>⑤</sup>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被视为工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在慕尼黑,我们的研究传统也被伊尔姆伽德·斯泰因尼施(Irmgard Steinisch),梅里特·尼胡斯(Merith Niehuss)继承下来了。科卡与普乐(Hans-Jürgen Puhle)是从闵斯特去的比勒菲尔德。在那里,韦乐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所谓的

① Thomas Welskopp, Sozialgeschichte der Väter. Grenzen und Perspektiven der Historischen Sozialwissenschaft, 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4(1998), S. 169 - 194.

② 在德国学术界,男性博士生导师俗称 Doktorvater,意为“博士之父”或“博父”。

③ “比勒菲尔德学派”(Die Bielefelder Schule)指的是联邦德国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批判社会史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在比勒菲尔德(Bielefeld)大学工作而得名。但李特先生在此指出,批判社会史学派还有源自柏林的传统。

④ Gerhard A. Ritter, *Friedrich Meinecke. Akademischer Lehrer und emigrierte Schuler.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1910 - 1977*, München 2006.

⑤ Klaus Tenfelde, *Sozialgeschichte der Bergarbeiterschaft*, Bonn-Bad Godesberg 1977.

“比勒菲尔德学派”处于国际学术界关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前沿。后来社会史扩展了其研究领域,如妇女史、性别史以及文化史研究。

在霍布斯鲍姆的启发下,韦乐提出了整体社会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中,社会史成为了历史的核心。不过它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支持。我本人愿意与罗森伯格一样认为,历史之神克里奥的宫殿里有着许多房间,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处于中心位置的、美丽的房间属于社会史,但还有属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房间。

社会史研究在初期也受到了工人运动史研究的巨大推动,当时人们还没有将工人史从工人运动史研究中独立出来。后来资产阶级史、贵族史、自由职业者史的研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也出现了文化史,而且文化史还同社会史进行了较量与争论。

问:批判社会史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德国历史,尤其是解释为什么纳粹党能够于1933年在德国上台并造成巨大灾难的问题。这方面最为有名的解释理论是所谓的“独特道路”理论。按照这种理论,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纳粹主义在德国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德国19世纪的现代化道路偏离了西方的模式,特别是在于政治与经济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不一致。我们知道,这一理论很有争议。您今天如何评价这一理论,它现在还有多大的解释力?

答:我同意对独特道路理论的批评意见中的大部分。我自己从来没有主张过独特道路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它有着相当大的方法论上的价值。也就是说,它提出的问题引发了一场广泛而富有成果的讨论。在方法论上,作为一条深入探讨德国历史的途径,它扮演了重要角色。罗森伯格关于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的著作在当时是一个突破,它对于比勒菲尔德学派来说具有奠基性意义,虽然在我看来关于在1873—1895年的德国存在着大萧条的论点的核心部分并没有得到证实。我认为独特道路观点大致也是如此。这一观点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强调德国官僚机构的强大,并有着一个在经济资产阶级与一个和国家关系密切的文化资产阶级之间特殊的、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的区分。第二个要素是封建主义传统的影响,今天对这一点的强调不是那么多了。人们发现,不仅德国的工业家,就是英国的工业家也喜欢拥有一个庄园;相反,人们同时也看到,像西门子那样的德国工业家并不一定喜欢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封建化理论已经所剩无几。继续有效的观点是,在德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1918年以前贵族在军队将领以及外交官中占着绝对优势。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被视为德国的反面的英国的发展道路也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我们可以说,英国走了一条独特道路,而法国与德国则比较相似。独特道路论题的主要价值是方法论方面的,即它提出了能带来很多成果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在比勒菲尔德与法兰克福不会有那么多关于资产阶级的重大研究。与国家关系紧密的文化资产阶级的存在西方应该是一个基本上只有德国才有的特殊发展状况。中国有着让学者担任高级官员的悠久传统。在德国,人们带着批判色彩把文化资产阶级比作中国古代的学者官员Mandarins。这是德国的特色,人们恐怕不会把一位美国教授称为Mandarin。

问:人们一般认为,魏玛共和国的宪法是以美国宪法为蓝本的,其中总统权力过大是造成魏玛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个人认为,恰恰是因为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总统与国会之间的二元对抗使得国家机器瘫痪了,由此给希特勒提供了夺权的机会。国会与总统相抗衡是西方民主国家制度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它也会影响国家管理的效率,这点我们也能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中看到。怎样才能在一个民主制度中防止党派之争危害到国家利益?

答:首先我要说的是,美国宪法并非魏玛宪法的范本。我对迈内克做过许多研究,对于迈内克来说,美国宪法应该成为德国的榜样。他在1918—1919年间建议德国设立一个美国式的总统,这位总统同时也应该是行政首脑。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不是政府的首脑,政府的首脑是总理。总统具有一些预备性功能,可以在议会制运转不良的时候起到替代作用。如果魏玛共和国的议会制运转良好,那么总统只是国家的象征,就像今天德国的联邦总统一样。是魏玛共和国末年议会制的运转不良,赋予了总统及其(没有国会多数支持的)政府强大的地位。最初的设想是,总统能将国会中相互对立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扮演一个统一团结的角色。艾伯特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而兴登堡则没有做到,因为政治势力过于极端化了。最后表明,宪法设计的强大的总统与议会二元制的后果是,政党与国会推托了责任,总统可以依据宪法第48条在紧急状态下赋予的权力组建政府,并颁布没有国会多数支持的法律。这一不良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德国政党制度的碎片化。另外,也因为政党在帝国时期没有组建政府的压力,所以养成了与议会制不相符合的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正是鉴于魏玛共和国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纯议会制的政治制度,总统只具有象征性功能,可以通过他的演讲对公共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并不拥有狭义上的政治权力。

问:您曾经说过,魏玛共和国也是失败于“社会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在我看来,今天南欧国家的危机与魏玛共和国末年的社会福利国家危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制度不能纠正社会福利国家的过度发展?难道我们应该认为,民主制度在根本上会推进这种发展趋势,因为政党为了讨好选民与压倒竞选对手必然会做出越来越高的福利承诺?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存在着政党为了选票在大选前承诺提高社会福利来压倒对手的现象,并由此给社会福利国家造成太重的负担。1972年的联邦德国就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社民党宣布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养老金改革,而联盟党也试图以更高的要求“从左边超越”社民党。我现在非常关注的是,德国在大选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sup>①</sup>我估计可能会成立大联盟政府,工会与企业家协会也都希望它能成立。您知道,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议会制度运转得还不错,当然也存在问题。导致魏玛共和国虚弱的主要因素是劳资谈判独立性(Tarifautonomie)的缺乏。也就是说,雇员与雇主协会就工资与工作条件达成协定的独立性,在魏玛共和国尤其是在其第二阶段并不存在。国家必须通过强制裁决介入分配冲突。这给国家造成了太重的负担。在今天的德国,不管是工会还是企业家都视劳资谈判的独立性为一种宝贵的价值。在很多的问题上,企业主与工人代表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政府过度地干涉劳资关系。恰恰是工会代表愿意为了保护企业的竞争能力,由此保护就业机会而做出许多让步。“社会伙伴关系”概念虽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其核心是正确的。

问:以往学界曾经普遍认为,魏玛共和国末年布吕宁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是错误的,是导致魏玛

<sup>①</sup> 指的是2013年9月22日举行的德国大选。

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您觉得布吕宁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合理性有多大?

答:您指的是“伯夏特论题”(Borchardt-These),是不是?<sup>①</sup>我与伯夏特先生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想,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将所有货币财富都化为乌有。因此德国人心中存在着对通货膨胀的巨大恐惧。其他欧洲国家都批评德国人因其历史经历而过于胆小。我想,总的来说,布吕宁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推动经济增长并降低失业率的政策空间很有限。当然,外交在当时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布吕宁非要实现让战胜国取消德国赔款的目标。如果实行大规模的公共开支政策,那么德国就难以维持自己没有能力偿还赔款的理由。关于财政紧缩政策本身有无必要的问题,很有意思,直到今天仍在争论之中。

问:再追问一下,一个民主国家能否通过选举自动地成为一个社会福利越来越高的国家,并且因此而积重难返?因为多数选民不是属于底层就是中层,富人毕竟是少数?

答:有这种可能,但有意思的是,运转良好的社会福利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我想德国也属于此类国家,都能很好地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俾斯麦时代的社会福利政策中就有体现。当时福利政策的对象不是最贫穷的人,而是收入相对好的专业工人以及低级别职员。与居无定所以及没有经过技能训练的工人不同,他们有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岗位,因此也能缴纳保险费。然后,还有其他中产阶级的群体(如手工业者),最后艺术工作者与农民都被纳入保险法适用范畴。总的来说,德国的主要政党还是很清楚,经济好比一只下金蛋的母鸡,不可以杀鸡取蛋,而是要维持其竞争能力,因此社会福利不能无限制地增长。德国21世纪以来对社会福利进行大幅度削减的“2010议程”是由一个社民党领导的政府提出的,这就很说明问题。

问:您如何解释东德解体的原因?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否比政治原因更为重要?

答:我们不能把两类原因分得很清楚。当然,如果东德的经济也像中国一样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它也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但东德人对于像西德那样的自由与法治国家的向往,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东德人一直把自己与西德人作比较,并由此看到了他们的不足。东德人可以看到并且很喜欢西德的电视节目。虽然他们不能在退休以前到西德旅游,但来自西德的访问者给他们带来了许多那边的信息。我的老伴在1989年以前给东德人寄送了几百个包裹。直到今天,原东德人还是把他们的生活状况片面地同原西德人相比较,而不是同自己在1989年以前的生活状况,也不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生活水准做比较。这会导致许多问题,因为现在德国东部的失业率还是比西部高,工资也比西部低。东德虚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再能够吸引青年一代。在东德建国初期,来自底层的人们有着很广泛的向上发展的机会。但后来这些机会变得越来越被封锁了,领导位置可以说被传给了精英的后代。特别是年轻一代为他们不能旅行,不能真正地分享国际青年文化特别是他们的音乐而感到不满。最后一点,与波兰与匈牙利不同,东德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尽管东德自70年代以后花

<sup>①</sup> 克努特·伯夏特(Knut Borchardt)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与李特先生同年,并共同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多年。就魏玛共和国失败的原因,西德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布吕宁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是错误的,只要增加公共开支就可以扭转经济危机,进而阻止希特勒上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伯夏特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伯夏特认为,布吕宁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别无选择,魏玛共和国前期社会福利与工人工资过高,德国经济必须挣脱过重的福利负担才能康复。“伯夏特论题”在西德学术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也折射了当时联邦德国现实社会与经济政策方面的斗争,虽然没有最后定论,但对魏玛共和国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伯夏特也因此,在1987年获得联邦德国科学界的最高奖项——莱布尼茨奖。

了大力气塑造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族,但它只能是一种人为的东西。到1989年秋,这些都加速了东德的解体。

问:在两德统一期间,您领导了东德历史科学的评估工作,您如何评价东德历史学的优缺点?重建东德历史科学的关键性措施有哪些?两德历史学的统一是否比政治上的统一处理得更好?

答:首先我要表达一个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在统一已经实现24年后的今天,政治上的统一总的来说是出乎意料的成功。当然在东部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与意大利不同,没有一个“梅佐乔诺”(Mezzogiorno),即一个在统一许多年后仍然非常落后的地区。除了经济上不发达的地区以外,东德现在已经拥有一些很兴旺的、生机勃勃的城市。自2005年以来,德国最为重要的政治家——联邦总理,是一位东德女性。联邦总统高克也是一位典型的东德人。其他东德人在政治领域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却并不突出。历史科学统一的情况在东部各州都不一样,因为在德国,州政府对本州境内的大学有着很大的管理权限。在我工作的柏林,洪堡大学历史学专业原有的同事只有少数几位被接收,其他人都因年龄原因离开了。在勃兰登堡州的大学,人事上的连续性要大得多。东德历史学的成就总的来说是比较弱的。当然,这并不是指所有领域,在宗教改革史、中世纪史领域东德有着很重要的成果。在社会史领域,哈特穆特·茨瓦尔(Hartmut Zwahr)撰写了很有特色的著作,得到了西部社会史学家的完全认可。但是,一些东德历史学家往往只选择了紧跟眼前政策路线的立场,连把马克思主义以智慧的方式真正地作为研究与诠释的基础都没有做到。个别历史学家因与安全部门合作而没有被接收的事情只是例外。总的来说,是因为他们在学术思想水平上跟不上。因为他们像1945年的整个德国那样,被封闭于国际学术界之外。在历史学以外的学科,情况当然不一样。自然科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小。这里的问题是,科研人员得不到科研所需的价格昂贵的仪器设备。总的来说,原东德的历史学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不过中小学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里的变化要少得多。对于一位西德人来说,到原东德地区去当教授,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而去那里当中小学老师,则不那么有吸引力,去的人有时会遭到东部同事的冷眼与学生家长的拒绝。但我们说到这些的同时,也必须强调,东德的中小学提供的自然科学教育要比绝大多数西德的中小学要好。许多最近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东德中小学生的英语水平较差。这可以理解,因为那里的英语教师所接受的培养较差。但东德的12年学制为学生在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提供了充分的准备。

问:重建东部历史科学的关键性措施有哪些?

答:我只能说说洪堡大学的情况,但它每个专业的情况又很不一样。我们试图通过所谓的结构与招聘委员会对法律、经济学、哲学、教育学、历史学等专业领域进行改革,它们应该通过解聘这些专业的教师而得到重建。但洪堡大学对此提出申诉,理由是这些岗位继续存在,因为学院不能长期关门。这一申诉在劳动法庭的二审中获得成功。最后柏林市政府只能在市议会提出并通过一项法案,按照这一法案,洪堡大学的所有教授岗位,包括自然科学的专业以及医学专业等都必须通过新的招聘程序重新入岗。作为结构与招聘委员会主席,我负责历史学与民俗学专业的具体招聘工作。其中20个岗位收到了500份申请。聘请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如果学术水平相当,则来自东德的申请人优先。结果只有少数东德人申请成功,绝大多数岗位被来自德国西部或外国的申请人获得。当时柏林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一些顶级的科研人员都来申请。没有申请成功的原东德历史学家能够在附

加的岗位上继续工作。在其他专业领域,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医学,申请成功的东德人则更多。其他东部州的历史专业也是如此,那里没有将所有岗位都重新招聘,只是对在岗人员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考察。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我们在做这些工作时,不仅要东德的同事负责,而且首先要对学生负责。他们需要良好的职业培训,以便在未来能够赢得职业上的竞争。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给东德的科研后备力量一个机会。总的来说,大学的改革恰恰在历史专业领域是成功的。例如,洪堡大学被评为德国的“精英大学”,由此获得了额外资助。总的来说,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东德的大学里一般都比西德要好。开始时,在新应聘的与失去岗位的以及因年龄关系提前退休的教师之间,关系是很紧张的。在学生层面也有矛盾,现在则没有了。恰恰在洪堡大学,它在德国西部以及国外都很有名,来自德国东部与西部以及国外的学生能够在这里很和谐地一起学习。

问:在第三帝国时期,曾有许多德国历史学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纳粹政权服务。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德国史学史上一个黑暗章节。您如何看待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学家如何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答:在纳粹时期确实有一大批德国历史学家为纳粹政权服务,而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历史学家也积极追随纳粹党。大多数年龄较大的历史学家是民族主义者,但不是纳粹主义者。他们认为可以在纳粹统治下继续工作,很少有历史学家作出抵抗或加入反对派。最有名的抵抗者是格哈德·黎特(Gerhard Ritter, 1888—1967),他与我同名同姓,但完全没有亲戚关系。我最初的名字也是Gerhard Ritter,后来我在老师的建议下在名字中加上了Albert的缩写A,以防止被弄混。我的老师汉斯·赫尔茨费尔德(Hans Herzfeld)曾经对我说“黎特先生,如果别人不再问您是否是他(黎特)的儿子,而是问他是不是您的父亲,那么您在事业上就成功了”。黎特是唯一一位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却参与抵抗运动(格德勒小组)的历史学正教授。他在1944年“7·20”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被盖世太保抓捕,但最后得以脱险。在纳粹时期,许多年轻历史学家都流亡了,尤其是那些按照纳粹的概念“有犹太血统的”或者与“犹太女性”结婚的历史学者。我以迈内克的学生为例对此进行了研究。

纳粹时期德国历史科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他们失去了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也就是变得封闭与孤立了。这使得国外的研究成果很少得到引用,当时国外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在纳粹德国几乎没有得到引用。

对于社会史来说,纳粹时期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与对国家及其政策以及思想史的片面重视(这是1933年以前德国历史科学的标志)相反,“族民史”(Volksgeschichte)兴盛起来。二战后,“族民史”的某些思想以完全不同的面目进入了社会史研究。总的来说,确实有历史学家服务于纳粹政权,有些历史学者为了在事业上出头而积极追随纳粹政权。无疑,当犹太裔同事或者是社民党或民主党成员的同事被撤职时,很少有人发出不平之声。就今天来说,也存在着类似的危险。国家与社会,他们代表着某些利益,通过对大项目的资助对历史科学施加着太大的影响。即便有人明确保证(一般都会作出这样的保证),他们不会影响研究的结果。但是,如前所述,科研计划不仅因学术质量而得到资助,而且也因其符合某种公共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能够坚持其独立性,并且严格遵守其专业标准,如严格的史料批判。如何做,这可以在初级讨论班以及随后的专业训练中学习到。肯定没有摆脱政治影响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只要国家或社会组织通过分配岗位与科研经

费发挥巨大影响。但总的来说,专业标准恰恰在最近几十年里基本上得到了更好的坚持。例如在企业史研究中,在过去此类著述一般都在企业周年纪念之际出版,带有企业祝贺文集的特征,今天却有一系列著述,它们对企业及其历史进行了批判性很强的研究,如研究它们在纳粹时期接收犹太人财产或者雇用劳奴的历史。对国家各部委在纳粹时期的历史的研究,现在在德国很时兴,也很明确地突出了它们与纳粹灭绝政策的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德国与西方历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您如何看社会史研究在21世纪的前景?

答:我不像其他人那样持怀疑态度。我相信,社会史能够站得住脚,但只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尽管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如前所述,历史学之神克里奥的宫殿里有着许多房间,分别属于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性别史、制度史、外交史,当然还有人物史(传记)。在德国,最近记忆文化有着很大的发展,有许多记忆场所,如关于纳粹时期迫害的,但很少有关于东德时期的。但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内容远多于记忆,远多于人们记住的东西。当然,新方法与新原始资料进入了现代历史科学,如媒体与图像,又如对量化材料的研究,包括最近几十年历史的研究中对历史证人的采访。不过,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已经84岁了,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完全接受这些新发展与新方法,并且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

最近十年里发展特别迅速的领域之一是全球史。长期以来,德国历史科学专注于德国或者奥地利的历史,最多是在较大范围内纳入了英国、法国与意大利的历史。不过,很久以来就有过东欧史的讲席。因为人们很清楚,如果要进行认真的东欧史研究,就必须掌握俄语或波兰语。这些语言德国人在中小学里学不到。二战以后,西德又设立了美国史讲席。而非洲、拉丁美洲、印度,还有东亚在德国历史科学中被忽视。这当然也是因为,德国只拥有一段很短的、不那么重要的殖民历史。今天像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这样的学者在年轻一代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在其著作《世界的变迁》中撰写了一部19世纪的全球史。<sup>①</sup>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这里的问题当然是,要真正地研究日本或中国的历史必须掌握这些对于欧洲人来说难以学习的语言。其他发展趋势,我的看法比较保留。如将经济史基本上脱离普遍史或社会史来研究。在德国与美国,国民经济学已经高度数学化,已经脱离了原来与历史学的紧密联系。我对此感到很遗憾。最后我认为,科学史具有特殊意义。东德解体的关键性原因之一是,它在现代科技发展方面同国际先进水平掉了队。这也是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的原因,但他随后就像歌德的著名诗词里所说的魔术学徒那样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以前人们常说,经济是我们的命运,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是我们的命运,而历史学应该比以往更认真地研究科学的发展以及它对现代世界发展的意义。

(受访人格哈德·A. 李特,生前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  
采访人景德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吴英)

<sup>①</sup>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 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 2009.